

一般論文

# 量化評鑒之下的學業／學術實踐： 對傳播領域研究所教育中獎懲機制的 探索式觀察\*

李紅濤\*\*

\* 本文作者感謝兩位匿名評審中肯的批評與修改意見。本文初稿曾在2007年第五屆世界華文傳媒與華夏文明傳播學術研討會宣讀，蒙發表場次評論人翁秀琪教授、主持人林靜伶教授另及徐美苓教授的鼓勵與修改建議，特此致謝。

\*\* 李紅濤為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博士候選人，E-mail：hongtaoli2@student.cityu.edu.hk

## 摘要

本文借助深訪資料，在數量化的獎懲機制與單位型的學術發表這兩種結構環境之下，檢視中國大陸新聞傳播領域研究生的學業／學術實踐。本文認為，研究所中的獎懲機制，形同數量化的評鑒機制，將「尋求發表」設置成研究生學業實踐的軸心，並驅使他們進入學術生產管道。而這種「契合」關係，也醞釀出種種「尋租」行為。從傳播學術教育角度視之，這種學業實踐路徑過分強調「尋求發表」，反而排擠了「學術訓練」在學術教育中的應然位置。

關鍵詞：數量化學術評鑒、學術發表、獎懲機制、契合關係、傳播學術教育

智慧藏



## 壹、引言

2006年，中國大陸一家媒體曾刊發有關學術論文交易的新聞報道（同「報導」<sup>[1]</sup>（王壽臣，2006），其中被廣泛轉載的一個細節，是一位研究生爲了完成在核心期刊發表論文的任務，靠賣血交納了「版面費」。在媒體的論述中，這起聳人聽聞的事件，「元兇」正是絕大多數高等教育院校所規定的「研究生必須發表一至兩篇學術論文，才能畢業」之要求。這種制度深爲某些學者所詬病（王彬彬，2003；江曉原，2007；錢榮貴，2006：137-138），而媒體則以數字形式，顯示學術期刊有限的版面資源和日益擴增的研究生／論文數量之間，已發生不平衡狀態，以此抨擊該制度的荒唐之處（王壽臣，2006）。

在中國大陸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所教育中，獎懲機制普遍存在，發表論文才能畢業的規定，只是其最低要求；深入地說，這其實是盛行於學界的數量化學術評鑒（同「評鑑」）體制之翻版，或曰簡單化的移植和複製。因此，儘管媒體著墨於事件的情節與戲劇性張力，但也折射出數量化學術評鑒制度與學術發表體制相互碰撞所激盪生成的亂象。近年來，華文學界對數量化學術評鑒多有批判，例如，台灣學者曾於2004年9月25-26日，舉辦「反思台灣的（人文及社會）高教學術評鑒研討會」，並於會後結集出版《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台灣學術評鑒》（反思會議工作小組，2005）。中國大陸尚未產生如此規模的公共討論，對獎懲機制的思辨，僅散見於期刊與網絡（同「網路」），其中較爲系統者，是鄧正來主編的《中國書評》。該刊從第一輯起，即闢有「知識生產機器的反思與批判」專欄，意圖接續八〇年代力使社會科學擺脫意識型態控制的「去政治化」運動，以及九〇年代初期的「學術規範」運動，將對社會科學自主性的討論向前推進。但現有對學術評鑒的討論，多從結構與制度的角度切入，進行反思與批判，而較少從個體學術實踐角度著手，從事經驗層次的檢視。此外，多數討論單純集中於學術評鑒制度，而未能將其他結構化制度納入相互關聯的框架中探討。

本文試圖聚焦於中國大陸新聞傳播領域研究所教育中的獎懲機制，探討學術評鑒與學術發表制度所構成的結構性環境，如何形塑研究所學生的學術／學業實踐。其實，無論是學術評鑒制度，抑或是學術發表體制，最終都會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到個體學術實踐之中，這也是結構化環境影響整個學術生產的真正起點。因而，檢視評鑒制度（具體為研究所獎懲機制）之下的個體學業／學術實踐的意義，一方面可以在結構性的批判之外，為評鑒制度與發表體制的具體運作，及其對學術生產的影響，提供經驗性證據；另一方面，亦可從特定面向，提出對新聞傳播學術教育的反思。

自 1997 年起，中國大陸將新聞傳播學列為一級學科，傳播學也以「二級學科」的名義，在學科體制中獲得合法性，新聞傳播學的研究所教育在學位授權點和招生人數方面狂飆突進。<sup>[2]</sup>截至 2005 年，全國共有新聞與傳播學碩士點 123 個，其中新聞學 60 個、傳播學 63 個；博士點 19 個，其中新聞學 10 個、傳播學 9 個（張曉鋒、馬匯瑩，2007）。但相較於研究所教育的大規模擴張而言，新聞傳播學界對培養目標、學術訓練等相關問題的探討與反思，卻相當匱乏（胡春陽，2008）。

從相關討論與現實社會情境出發，本文擬針對以下問題作探索式的研究：

(1) 在何種意義上，對研究生進行優劣評價的獎懲機制，其實正是數量化評鑒體制？

(2) 獎懲機制與學術發表體制如何在學術生產中具體運作，並合力塑造研究所學生的學業／學術實踐？

(3) 獎懲機制的運作，產生哪些個人化或結構化的後果？這些後果與研究生教育的理想目標，或者與學術環境本身，構成何種關聯？

為使討論更為集中，本文將對 X 大學新聞傳播系所獎懲機制之運作，從事初步探察，進而對整個領域和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作一反觀。作為個案的 X 大學是一所綜合性的全國重點大學，也是中國大陸於八〇年代最早開辦新聞傳播教育的院校之一，現在開設多個本科相關系所，

並擁有新聞學博士點及新聞學與傳播學碩士點，綜合實力位居國內該領域前列。本文的研究資料主要來自於該所七位研究生平均歷時六十分鐘的深度訪談。最初的訪談對象乃通過私人關係甄選，之後則以滾雪球的方式，擴大訪談對象範圍。同時，為顧及深訪樣本之代表性（Strauss & Corbin, 1998: 202），本文從研究所課程類型（訪問二位博士班學生，<sup>[3]</sup>五位碩士班學生）、所在年級（訪問碩士班三年級三位、二年級一位、一年級一位）及在獎懲機制中的表現（訪問一位曾在碩士班階段被評定為「優秀」的博士生）等歸類，對樣本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定。為了簡單比較其他學校的情況，我們通過書面形式，與另一所重點院校 Y 大學的四位同學（新聞傳播碩士班二年級一位，新聞博士班一位，理工科博士班一位，理工科碩士班一年級一位）接觸、探詢，以充分瞭解相關訊息。此外，在另一項研究中，作者對數位新聞傳播領域之青年教師、碩士研究生導師與系所主管的訪談，也涉及了研究生獎懲機制的內容，因此下文的論述將納入這些訊息，以此在部分程度上，彌補本文因集中關注研究生層面而可能導致的視角局限與偏狹。

本文共分四個段落。第貳部分討論科學社會學對獎懲機制與學術發表體制的規範性論述與經驗研究，在此基礎上，對中國大陸處在國家規劃下的數量化評鑒機制與單位型學術發表體制，進行「情境化」探討，這一探討將構成本研究的社會背景；第參部分以 X 大學為個案，討論研究所獎懲機制的基本結構，揭示它作為數量化學術評鑒的根本特徵；接下來藉由深度訪談所得經驗材料，鋪陳新聞傳播領域研究所學生如何與數量化獎懲機制及學術發表體制相「契合」，展開其學業／學術實踐；第伍部分從具體的學術實踐中，反思獎懲機制對傳播學術教育或學術訓練的可能影響。

## 貳、文獻與研究背景

### 一、發表與評鑒：學術實踐的制度化環境

現代社會的學術實踐已經不再是個體純粹的智識活動。相反地，它被放置到建制化（institutionalized）的生產、傳播與消費流程之中，經由大學制度、評價制度、出版制度、職稱制度、課題（同「研究專案」）制度等嚴密的「盯視」和建構，變成一種知識生產和再生產的活動（鄧正來，2004b），學術實踐的個體也因而處在重層的機構環境之中。正如 Light（1974）所論，學術這一行無異是大學教員（faculty）與知識職業（scholarly profession）相交匯的領域：一方面，它與知識職業一樣，最為核心的活動是知識生產與累積；二方面，其實踐者又同時在高等教育中佔據特定學術職位。易言之，學術這一行的結構具有兩端：一端是大學系所，學術實踐者在此扮演教師角色；另一端則是專業社群，實踐者以研究者的身分活動其間。這兩個機構成爲學術實踐者進行知識生產活動時，最直接、切身的社會環境（Gumport, 2002: 2, 7）。

身處在雙重結構環境中的學術實踐者，其職業生涯被兩種至爲重要的學術制度所塑造，它們分別是大學系所中的「學術評鑒」制度，以及專業社群中的「學術發表」制度。學術社群的要義，乃是個體實踐者的工作，指向同一社群中其他人的工作，並與後者結合在一起（Haskell, 2000: 18）。學術社群的核心機制是一系列正式與非正式的交流管道，其中最爲重要的是學會與學術期刊，它們將分散於不同學術機構中的研究者聯結起來，構成「有形的『無形學院』」（同「有形的『隱形學群』」，visible “invisible colleges”）（Altbach, 1987: 177；Crane, 1972）。而學術期刊則是學術生產系統中最爲重要的「把關人」（同「守門人」，gatekeepers），唯有經過學術發表系統，個體的學術產出才得以進入學術社群的公共空間，且這一步，正是評量專業表現、施加社會控制，或授予學術榮譽等諸多社群生活層面的開端（Becher & Trowler, 2001: 86；Zuckerman & Merton, 1971）。

亦即，學術期刊作爲「制度化的評價模式」（institutionalized patterns of evaluation）（Zuckerman & Merton, 1971: 66），構成了科學實踐中品質控制系統的重要關節點。至於大學系所內，針對學術工作進行的評鑒

，則指向學術生產的「消費」環節。由於現代科學社群是「聲譽工作組織」(reputational work organizations)，學術同儕之間對聲譽的競爭，無異是組織手中首要的控制機制 (Becher & Trowler, 2001: 75; Hagstrom, 1975: 69; Whitley, 2000: 25)。一如西諺所云「不出版就完蛋」(publish or perish)，學術發表是重要的學術認可來源，也是任命、升遷與提升個人學術聲譽等種種學術評鑒活動的依據 (Caplow & McGee, 2001: 83; Light, 1974)，因而大學機構裡的學術評鑒制度，必然與學術發表制度緊密扣連。學術評鑒制度不單單與學術行政有關，更是關乎知識生產的政治經濟學問題 (陳光興、錢永祥，2005)。

在現代大學體制下，特別是英美的實踐中，學術評鑑和學術發表兩種制度都建立在同行評審 (同「同儕評議」，peer review) 的根基之上。誠如 Zuckerman & Merton (1971) 所論，評議人 (同「評審」) 制度——對編輯和評審等評議者的系統運用——構成了控制科學品質的核心機制。同行評審作為評價科學工作的組織化方法，被學術實踐者用以確立研究結果的可信性，進而分配期刊版面、研究基金、學術聲譽等稀缺的資源 (Chubin & Hackett, 1990: 2)。這一實踐假定，良好的科學只能由一個自我管治的專家社群創造出來，而同行評審則是科學界進行自我管治的重要渠道 (Chubin & Hackett, 1990: 1)；故此，同行評審賦予學術場域較高程度的自主權，令它獨立於政治經濟場域、支配文化以及其他專業團體之外 (Whitley, 2000: 32)。這種自主性進而確保學術社群在招募與訓練新成員、判斷成員的專業成就，以及規制專業工作的品質等各方面，擁有了排他的權力 (Light, 1974)。

同行評審的制度化，最早可追溯至十七世紀中葉皇家學會 (Royal Society) 創辦的《哲學學報》(*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Chubin & Hackett, 1990: 19; Zuckerman & Merton, 1971)，它所開創之「由學會成員評議其他成員學術工作」的作法，在往後的幾個世紀中，慢慢演變成學術期刊的評議人制度，並且拓展到學術生產的其他層面，諸如研究經費的審批、學術成績的評鑒，以及學術失範行為的判定等，最終成為整

個科學事業的根基所在 (Chubin & Hackett, 1990: 19-24)。

有關科學精神的規範性，Merton (1968, 1973) 認為，評判科學成績優劣的標準，只能是成果本身的品質，而不是研究者的社會特徵。科學社會學對學術發表制度的經驗性研究，主要即是從此一規範化的假定出發，檢視同行評審的實際運作。此處，研究者借用「把關」(同「守門」) 這個隱喻式的概念，捕捉學術發表過程的兩個關鍵，即把關人與把關過程。

學術期刊編輯、編委會成員與評議人是學術志業公共論壇的把關人 (Boots, 1996; Crane, 1967; Lindsey, 1978)。研究者發現，儘管不同學科之間存在差異 (Lindsey, 1978: 50)，但絕大多數把關人是資深的研究者 (Glogoff, 1988) 或權威人士 (Zsindely & Schubert, 1989)。此外，把關人在不同機構與國界之間的分布並不平衡 (Altbach, 1987)：首先，把關人高度集聚於菁英機構 (Hamermesh, 1994; Yoels, 1974)，儘管把關人所在機構變得愈來愈多樣化，但一項對 30 種經濟期刊的研究仍然發現，近 40% 的編輯來自於 12 所美國大學 (Hodgson & Rothman, 1999)。其次，國家之間的集聚更為明顯，例如在很多情況下，學術期刊之主編及編委會成員均為美國學者主導，甚至壟斷 (Braun, 2004; Braun & Diospatonyi, 2005; Nisonger, 2002)。

絕大多數以學術期刊為對象而從事的經驗性研究，通過調查、評議人的個人討論與引用分析等方法，集中探討學科範式 (同「典範」) 與共識 (paradigm and consensus) (Hargens, 1988; Pfeffer, Leong, & Strehl, 1977)、論著特徵 (manuscript characteristics) (Kerr, Tolliver, & Petree, 1977)、特殊主義 (Beyer, 1978)、評判標準 (Lindsey, 1978)、編輯政策 (Beyer, 1978)、評議人風格 (Beyer, Chanove, & Fox, 1995) 等因素對學術發表過程的影響。另一方面，許多研究亦指出，學術期刊潛在地存有對於複驗 (replication) (Bornstein, 1990; Greenwald, 1975; Kerr, Tolliver, & Petree, 1977)、否定結果 (Beyer, Chanove, & Fox, 1995; Newcombe, 1987)、聲望較低的研究者 (Kerr, Tolliver, & Petree, 1977)

或研究機構 (Dinauer & Ondeck, 1999; Long & McGinnis, 1981; Peters & Ceci, 1982) 的偏見。不過，儘管存在著諸多缺陷，同行評審實踐仍然處在科學實踐與學術期刊運作的核心 (Campanario, 1998)。有論者將之比作民主制度，意即它雖然充滿問題，但卻是我們所擁有的危害最小的制度 (Smith, 2006)。

從以上的文獻討論，我們發現，科學社會學對學術發表制度乃至學術評鑒制度的研究，建基於高度建制化的同行評審實踐。這使得此類研究在進入具體討論時，往往將同行評審視為先設（同「預設」）架構，並將焦點集中於同行評審不同層面的操作細節，立意於制度的具體修補與改善，卻擱置了與學術評鑒、學術發表制度相關聯的結構性問題。當我們在中國大陸、台灣或其他華文學界等不同歷史與現實情境下，討論學術發表制度與學術評鑒制度時，這些被視為理所當然並排除在解釋框架之外的結構性力量，例如國家權力、機構利益等，不僅呈現出迥異的面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這兩種學術體制的形態與運作方式。

## 二、國家規劃下的量化學術評鑒

國家權力即是在如上的討論中，被排除在外的結構性力量之一。直言之，同行評審的根本目的，是賦予學術社群獨立於政治權力干預之外的自主性；但弔詭的是，在中國大陸的社會科學學界，關涉學術評鑒與學術發表制度，乃至整個知識生產體制的「先設架構」，恰恰並不是同行評審，而是在諸多領域扮演全權角色的政治權力（任劍濤，2006）。

政治學者任劍濤（2006）認為，國家之所以成為中國知識生產機器的主導性力量，是因為在知識生產的結構中，「國家」扮演著知識生產設計者、資源配置者與知識成果決定性購買者等角色。這種全權國家的解釋視角，很好地呼應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界與國家權力的關係。不過，除此之外，知識生產的國家化，也牽涉到提高國家競爭力這一目標，因為該目標直接觸及到科學技術、產業與高等教育等諸多相互糾纏的領域（陳光興、錢永祥，2005：11）。例如，許紀霖（2005b）認為，二

十世紀九〇年代以來，這一波知識生產的「再度國家化」，源於學術成果被納入到國家的整體目標之中，成為實現「和平崛起」強國夢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其實現途徑也有別於改革開放之前的政治意識型態控制，而是通過「計劃學術的宏觀管理」和「技術理性的支配原則」等非政治化的方式。

無論怎樣，國家權力對於學術生產的深度介入，一方面將學術生產的方方面面置於國家權力的籠罩之下，另一方面則將「研發」與「政策」培育成主導的學術生產方向，從而造就了所謂的產官學複合體（陳光興、錢永祥，2005），或曰國家規劃型的知識生產模式（鄧正來，2004a，2004b）。這種國家主導的「知識規劃」，不僅僅框定了知識生產的方式，也塑造出獨特的知識類型。鄧正來（2004b）認為，在自上而下的「知識規劃」時代，社會科學領域存在兩種相互映照的知識類型，分別是規劃的知識和違背知識場域邏輯的知識。

國家要實現對知識生產的規劃與控制，必須借助它所控制的各種學術制度，例如行政支配的課題審批制度（王焱，2005）、職稱評定與學科設置制度、出版制度等。表現在學術評鑒制度方面，對學術成果的「評鑒」——像是大學的排名與撥款、重點學術機構的評定、個體職業生涯的考核等，構成了規制大學、機構與個體學術活動的首要策略，而量化指標則作為衡量生產主體學術表現的唯一標準。其結果是，這種從上到下、鉅細無遺的學術評鑒，強化了國家權力對學術生產的控制，進而將國家權力、學術機構與個體三者捆綁到集體性知識生產與再生產的軌道之上。

國家規劃下的學術評鑒，其核心特徵是以數量化為導向，並以刊物評比的指標或索引，取代對學術產品直接的實質性評價（楊玉聖，2006）。在中國大陸，被視為「評鑒尺度」的主要是「核心期刊」和「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這些指標令學術期刊系統分化成高低優劣的等級體系，不同期刊在體系中的位置，對應不同的權重與「分值」，而在各期刊上發表論文的數量，則被累加計算成個體與機構的學術表

現。「核心期刊」這一指標的產生，可以追溯到 1992 年北京大學圖書館推出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sup>[4]</sup>它的初衷本是輔助圖書館等機構收集與索引學術文獻，但在九〇年代中期以來，「核心期刊」被納入對個體、學術機構以及大學的學術評鑒的軌道之中，並演變成主要的「評鑒尺度」（錢榮貴，2006）。另外一種重要的索引是由南京大學在 1998 年之後，逐年發佈的「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從其命名即可看出，CSSCI 乃是仿照美國湯普森公司（Thompson Inc.）的 SSCI 創制。但與 SSCI 不同的是，CSSCI 是大學機構在政府的直接指導之下發展出來。如其官方網站的自我介紹所示：（見 <http://www.cssci.com.cn/introduce.htm>）

「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是國家、教育部重點課題攻關項目……教育部已將 CSSCI 數據作為全國高校〔高等教育院校〕機構與基地評估、成果評獎、專案立項、名優期刊的評估、人才培養等方面的重要指標。CSSCI 資料庫已被……100 多個單位包庫使用，並作為地區、機構、學術、學科、項目〔即研究專案〕及成果評價與評審的重要依據。教育部在 2003 年 1 號文件中指出：要建立科學公正的評審制度和評價體系，加快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系統的建設。在教育部直接指導下，南京大學……使 CSSCI……成為我國人文社會科學評價領域的標誌性工程。

此一索引不僅僅被當成資料庫使用，而是從最開始就被有意設計成一個「評鑒指標」，也因而變成「由國家推動、成為學官建立學術權威的標尺」（陳光興、錢永祥，2005：28）。

學術評鑒中表現出的知識生產「國家化」的傾向，不僅僅存在於中國大陸。依據陳光興、錢永祥（2005）的觀察，台灣、新加坡、南韓等地，也在彼此競爭的壓力下，開始把學術生產作成可以量化的指標，歸

結到國家總體競爭力來計算，以量化得分多少來實施獎懲。在他們看來，這種傾向乃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攜資本為動力／後盾並與各地的國家機器結盟的結果。<sup>[5]</sup>由是觀之，處在國家規劃之下的學術評鑒，實際上正展現了中國或其他類似地區人文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兩個向度（鄧正來，2004a），其一是學術場域與其他場域——特別是國家權力——的關係，其二則涉及到本地社會科學在世界結構下，與西方社會科學場域之間的關係，後者表現在學術評鑒當中，即是 SSCI 與 T/CSSCI 之間的高低優劣次序（陳光興、錢永祥，2005；黃厚銘，2005）。

### 三、「單位」型學術發表體制

如前所論，學術期刊既是制度化的評價模式，也是知識生產流程中最為重要的把關人。通過選擇特定學術產品進入公共空間，學術期刊累積學術發現與知識，設定學術研究的議程，同時亦充當學術實踐者之間的正式交流管道。此外，由於經由學術期刊進行的學術發表，在眾多學術評鑒中佔有優先地位，學術發表制度更成為塑造整個學術實踐的結構性力量。以中國大陸為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計有學術期刊近三千種，據學者按照期刊印張數和論文長度（約三頁）<sup>[6]</sup>的抽樣測算，這些期刊每年發表論文約五十一萬篇（葉繼元，2005）。但對於這個處在學術生產體制核心的「龐大的」關鍵制度，學界往往集中於評論與批判學術規範層面的「失範」行為，如學術抄襲、版面費等，卻極少針對學術期刊的總體結構與專業實踐，進行經驗性的觀察與探討。

與整個出版業同步，中國大陸的學術期刊亦必須獲得由新聞出版署頒發的「連續出版物號」（簡稱「刊號」），同時擁有主辦單位和主管單位，才能夠獲准出版。這兩項規範，一方面將學術期刊的生死存亡與日常實踐，置於國家權力的監管之下，另一方面也使得絕大多數的期刊，變成特定機構的附屬品，並被嵌入到主管單位、主辦單位構成的垂直權力結構之中，成為集國家命令性權力和資源交換性權力於一身的「單位社會」（work-unit society）的一部分。依據社會學者的觀察，在中國社

會中，「單位」不僅僅是「工作場所」，更是一種高度整合和低度分化的組織型態。而作為一種統治制度或社會結構的「單位」，則構成了國家實現統治的中介環節（李路路、李漢林，2000；李漢林，2004；李漢林、李路路，1999）。就此而言，學術期刊的「單位化」，在很大程度上，無異塑造著學術發表系統的總體結構與專業操作。

學術期刊歸於特定單位所有，第一個影響是學術發表系統遭「雜誌型」（同「雜誌型」）綜合期刊壟斷，專業性的學術期刊只佔很小的比重。由於期刊背後必須由特定的單位支撐，很多期刊實際上充當著各種學術機構的學報（馬忠文，2007；許紀霖，2005a；錢榮貴，2006）。為符應單位本身的學科設置，並滿足多學科的發表需求，一冊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報，其欄目設置與刊載之論文，通常橫跨哲學、人文、歷史及社會科學諸多門類，成為典型的「雜誌型」綜合期刊。即使是占據少數地位的專業性期刊，也並非全部立基於特定學科領域的學術社群。以新聞傳播為例，該領域擁有正式刊號的學術期刊共有五十餘種（中國新聞年鑒社，2005；杜駿飛，2007），其中16種分列在「信息與傳播」（同「資訊與傳播」）、「新聞學新聞事業」及「廣播電視事業」三個子目錄下，被列為2004年核心期刊，內有9種曾被收錄為CSSCI期刊。新聞傳播學術期刊大致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其一是由大學新聞院系主辦，其二是由半行政或半官方的行業協會主辦，而數量最大的一批，是由報業集團、廣電集團等新聞媒體主辦（李良榮，2003；郝俊慧，2005）。以核心期刊的機構附屬狀況來看，其中只有4種、約佔25%為新聞系所或研究機構所辦，其他12種為媒體機構或行業協會所辦。

單位制的第二個影響，則指向學術期刊的專業實踐層次。有關中國大陸學術期刊的知識生產活動，由於素來缺乏經驗性研究，我們只能依據學者的評論，進行簡單的探討。一般認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期刊，尚未普遍確立嚴格的同行評審制度，而由所屬單位成員組成的期刊編輯部，即為整個把關過程的核心主體（許紀霖，2005a）。這使得學術期刊無論從組織、人員或專業實踐等層次，都被捆綁在所屬單位之上

，無法直接面向特定領域的學術社群，也導致「機構利益」在學術期刊主導的知識生產中，扮演重要角色。早期的經驗研究發現，由大學本身編輯的期刊，傾向於刊發更多本校校友的著作（Shamblin, 1970）。而在中國的特定學術情境下，很多大學學報也儼然是該單位「學術福利的自留地」（賀衛方，2004）。一項針對傳播領域從事的抽樣調查即顯示，一份附屬於大學的期刊，在 1993 年至 2003 年刊登的稿件中，該大學作者所發表的論文，佔總量的三分之一，五倍於位列第二的另一學術機構（張瑩、申凡，2004）。

許紀霖（2005a）以單位化、行政化與非專業化，總括說明了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總體結構與專業實踐表現。正是因為學術期刊的發表成績，在個體職業生涯及學術機構評鑒中，扮演著至為重要的角色，加上學術期刊結構與專業操作層次的獨特處境，導致有關學術發表制度的批判聲浪，始終滔滔不墜。某些學者更直言，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刊物在某種程度上，已淪落成研究者「琢磨」如何發表論文的參照工具，甚至是個人為因應學術制度的規範，謀求「統計指標」的必須途徑和形式制度（鄧正來，2005）。

### 參、研究所獎懲機制：量化的學術評鑒

學術評鑒制度與學術發表制度編織而成的結構化環境，不僅影響到大學、學術機構與學術研究者個體，亦觸及到正在接受學術訓練的研究所學生。在研究所教育中，這種數量化的學術評鑒，亦已轉化為具體的獎懲機制。以下將透過 X 大學新聞傳播系所的個案，勾勒出研究所獎懲機制的面貌。

X 大學針對研究生的學業／學術實踐，設計了兩個層次的獎懲機制，分別指向「合格」研究生與「優秀」研究生之判定。第一個層次是決定他們能否畢業的最低門檻；也就是說，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生必須在公開出版的學術期刊上，至少發表一篇學術論文，才能成為「合格

」的研究生，進入答辯程序，而後畢業。第二個層次是中期分流制度；也就是說，在入學後的第三或第四學期，研究生要接受學院的中期評鑒，並依評鑒結果分為「優秀」、「合格」、「不合格」三類。其中優秀者可有各種選擇，例如提前一年畢業、直接攻讀博士，或維持正常畢業；合格者按原定程序繼續學業；不合格者原則上要被淘汰，或以肄業結束，不能繼續學業。

由此可見，第二個層次構成了「從懲罰到獎勵」的完整光譜，而第一個層次也自然被置放於「懲罰」的一端。這是因為中期分流的標準，除對學位課程的基礎要求之外，亦以學術發表作為最核心的評判依據。達到最低發表要求的研究生，可避免「不合格」的結果，而那些在學術發表方面表現出眾的學生，則可獲得獎學金，並被評為「優秀」，持續在獎懲機制的光譜上，向「獎勵」的一端移動，得到更多的選擇機會。

對於學術發表成績的評鑒，構成了此一獎懲機制的實質性部分。表 1 即為 X 大學新聞傳播系所教務辦公室在中期分流和獎學金的評定中，具體採用的學術發表「評分細則」。

表 1：學術發表評分細則

期刊類別	分值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權威核心期刊（按社科院的標準）	8 分	4 分	8/3 分
CSSCI 核心（南京大學標準）	4 分	2 分	4/3 分
普通核心	2 分	1 分	2/3 分
普通期刊（含增刊）	1 分	0.5 分	1/3 分

註：第一作者包含獨立署名作者；第二、第三作者分值為第一作者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

從評分細則可以看出，居於研究生獎懲機制核心的學術發表及其評鑒，完全是一套量化的規則，得分高低與刊發論文的期刊級別息息相關

，而這些分數的累加，就構成研究生的「學術表現」。依照表列的規則，發表於權威核心期刊上的一篇論文，相當於四篇普通核心的文章、八篇普通期刊的文章。換句話說，在這個金字塔式的學術發表等級制內，能在級別愈高的期刊上，發表愈多論文，必將有愈好的學術表現。

此處援用的評價邏輯，實質上是數量化學術評鑒體制的簡單化移植和翻版複製。回頭來看，在教育部的研究生學位條例中，並沒有「必須發表論文才能獲得學位」的條款。而所謂最低要求及其他更高的要求，之所以在研究所教育中廣泛存在，<sup>[7]</sup>無疑是大學和系所對研究生的學業生活進行控制、規訓與塑造的強力手段；同時，這樣的獎懲機制還與大學和系所「提升學術實力」的「組織目標」有關。某些教育者和學者的評論指出，大學試圖將碩士生和博士生納入學術生產機制，以提高整體的學術產出，從而在各種學術評鑒中，取得良好的表現（代小琳，2006；蘇力，2004：90）。如 X 大學的「學生條例」即特別註明，研究生用以滿足學位要求的發表論文，必須以該大學為第一署名單位。另外一所重點大學的老師提到，自己在所在學校讀研的時候，學校是要求碩士生在核心期刊發表三篇論文才能畢業，其原因無非學校「就靠著發表的這些文章數量來撐起門面」（學者訪談筆記 A，2008.04.17）。由此可見，獎懲機制通過「強求」或「鼓勵」的方式，希望研究生追求學術發表，並將他們納入整個國家規劃下、以學術評鑒和學術發表體制為核心的知識生產軌道；研究生也就是從這裡開始，領受獎懲機制和學術發表體制的碰撞，展開他們的學業與學術實踐。

## 肆、與體制「契合」：獎懲機制下的學業實踐

### 一、學術發表作為學業實踐軸心

如前所述，獎懲機制及與其呼應的學術環境，構成了研究生學業實踐的結構化語境。浸淫於雙重環境之中的研究生，透過對參照群體的觀

察、與其他個體的互動，以及同內外環境的直接碰撞，逐漸瞭解到自己學業生涯「合格」與「優秀」的判定依據，認識到獎懲機制的操作規則，亦對學術生產的邏輯和學術環境本身，有了初步的體察。

在 X 大學裡，研究生是在開學典禮上，首度聽聞有關獎懲機制運作、合格與優秀標準等各種信息。此後，來自於導師、歷屆學長姊的指導，以及其他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互動，皆不斷地豐富、強化這些信息，形成一個充滿暗示的氛圍，讓新進研究生慢慢領會到體制運作的微妙之處。

導師經常欺騙我某某同學又發了很多論文了，來給我壓力。  
(CB, 碩士班二年級)

最受「挫傷」的是研二開始評獎學金的時候。研一的時候，我還是多認真地對待寫論文。一年下來，發表了兩篇論文，雖然都是在一般的學報上，但我沒有交一分錢的版面費，都是靠論文質量發表出來的。我還很自豪的。結果評獎學金的時候，我一看另外一個同學，七、八篇論文，全是增刊、增刊、增刊，多數是花錢發表出來的。但就因為他／她的數量更多，他／她評上了獎學金，我卻沒有評上。(SZ, 碩士班三年級)

從許多正式與非正式的互動過程中，研究生對於獎懲制度得到的關鍵印象是：欲避免無法畢業的懲罰，或想在中期分流中表現優異，都必須「發表論文」。除此，更重要的是，在獎懲機制的具體運作中，真正要緊的是數量，而不是質量。這個初步社會化的可能後果，乃是形成研究生心中的「壓力」。

有〔壓力〕，關係第二年的學費。(ZX, Y 大學工科碩士班一年級)

我自己還有連續幾天夢見無法畢業，因為沒有發表論文。評優的壓力也有。(CB，碩士班二年級)

壓力自然是有的。包括研二下分流的壓力和畢業的壓力，畢竟我認為一名優秀的研究生應該有可以證明其能力的東西。(MW，碩士班一年級)

有壓力，但是不是來自於學校、學院，是來自於自己，來自於優秀的學長。(GP，中期分流後直博，博士班一年級)

壓力都是有的，有的人順從，有的人抵抗。(FX，碩士班三年級)

無論這種壓力反映了他們對這個評價體制的認同（「應該有可以證明其能力的東西」）與規則的內化（「壓力來自自己」），抑或只是可能的功利性的應對策略，皆屬默認「學術發表」是翹動整個學術實踐的軸心所在，也因而促使研究生進一步對該體制作出「呼應」。與這一規則緊密對應的是「如何發表論文」的問題。每年一次的研究生學習經驗交流會，即提供了這樣的機會，由具有豐富發表成績的二、三年級碩士班學生或博士生，向一年級新生介紹相關經驗。

學長們共同強調的是身分定位和寫作與發表論文的問題。寫作論文，平時的知識積累最為重要，但時間與技巧也不能忽視，至於論文的發表更是需要充分瞭解各個期刊的特點。<sup>[8]</sup>她就給我們講該怎麼樣找研究題目，比如經常翻學術期刊，看看別人都在研究什麼、熱點問題是什麼，就說寫熱點問題更容易發表。然後要通過什麼管道找到各種學術期刊的聯絡方式，怎麼跟編輯聯絡，這些東西。(CB，碩士班二年級)

這些經驗介紹，為新進研究生提供了可模仿的榜樣，亦提供了應對獎懲機制的各種策略。研究生在體制內的親身實踐，比如尋求學術發表

的過程，或者其間與學術期刊編輯接觸的過程，讓他們得以與學校環境之外更為廣闊的學術社群互動，而這種互動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他們對於學術界的認識。如前所論，多數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並未建立嚴謹的評審制度，從最淺表的層次來說，投稿的結果往往就是「發」或「不發」，而根本不會經歷「修改－提交」的往復過程，作者甚至也得不到隻言片語的評論（學者訪談筆記 B，2008.03.05；學者訪談筆記 C，2008.04.27），無異是把學術期刊變成純粹的「發表管道」，而不是「交流或訓練管道」。換言之，將論文投入學術期刊的生產流程，無法構成學術訓練的延伸，至於與學術期刊編輯之間的互動，對於學業實踐本身並沒有多少助益。

我還有我周圍的人跟編輯的接觸，就感覺編輯不太可能跟你討論一下論文還有什麼樣的改動的空間……最多有些編輯會說你這個注〔同「註」〕有問題，或者格式有點問題，但他不會說你這篇文章怎麼樣，從內容上跟作者討論好像很少很少的。（FX，碩士班三年級）

由於研究生通過交納版面費發表論文的情況相當普遍（詳見下節討論），這些有限的「互動」反而可能集中於這個方面。

我有一次給一個傳播學的雜誌〔核心期刊〕投論文，編輯就向我要「審稿費」，或者要訂一年的雜誌。但我就不想寄，就沒有寄。結果後來編輯就打電話來說，你怎麼還沒有把錢寄過來。（FX，碩士班三年級）

我有一個同學投了一篇論文，編輯給他打電話，說要〔人民幣〕900 塊錢版面費，我同學就跟他講，是學生，經濟條件比較緊張，可不可以便宜一些，750 塊錢行不行。編輯考慮了一下，就說沒有問題。（XR，博士班一年級）

從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研究生與學術期刊編輯之間為數不多的互動，很多時候並不是圍繞著「學術研究」展開，而可能是討價還價的過程。至於那些在增刊上發表論文，或者通過中間人、發表代理尋求發表<sup>[9]</sup>的「互動」，基本上便與交易沒有什麼區別了。

無論是來自導師的壓力、前輩的示範，還是與獎懲機制和學術期刊的碰撞，都讓研究生逐漸從學習、觀察與親身實踐中，瞭解體制的要求、操作規則和學術生產等種種現實。當研究生體悟到獎懲機制的核心是學術發表「數量」，且瞭解到學術生產體制種種合乎或者悖離理想之處，進一步爲了避免無法畢業的懲罰，或者尋求更高層次的獎勵，這種最初的認識都會驅使他們朝向特定的學業／學術活動努力，那就是「尋求發表」。

## 二、尋求發表：增刊、版面費與利益交換

X 大學新聞傳播系所碩士班學生乃採取「集體行動」的方式，應對獎懲機制的最低要求。2004 年至 2006 年，該學院「研究生會」在中期分流之前，都會跟當地的某些學術期刊合作，由後者出版一期該所二年級研究生的「專刊」（增刊）。以 2005 年 3 月份出版的某期《甲學報：新聞傳播研究》（「甲」爲代稱）爲例，該卷雜誌共 344 頁，刊登 131 篇論文，除了極少數其他院校、其他年級學生的論文，幾乎當年的所有新聞傳播類研究生都能刊登至少一篇論文。所刊文章當中，最長的 4 頁，最短的 2 頁，平均每篇所占篇幅爲 2.5 頁。

儘管刊出的論文並不一定能代表他們的學術水準——畢竟很多人只是爲了完成「任務」，不過，因爲這卷雜誌幾乎涵蓋了當屆所有的研究生，本文仍希望通過對這些論文「參考文獻」的瞭解，反觀他們所受的「學術訓練」。主要理由如下：獎懲機制的「初衷」之一，就是鼓勵研究生進行學術研究；研究生教育的目標之一，亦是讓學生接受初步的學術訓練；而在論文中使用參考文獻，則是最基本的學術規範之一。是故，在 131 篇論文中，我們抽取 72 篇進行簡單的統計。結果發現，從

文後的參考文獻數量來看，最少為 0 筆，最多為 11 筆，平均值大約為 3.1 筆。其中 6 篇沒有任何參考文獻或引用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在列有參考文獻的 66 篇論文中，共 34 篇在正文裡找不到任何與參考文獻對應的引文標記。若將「有文獻無引用」的論文與「無參考文獻」的論文累加，則所占的比例為 55.6%；換句話說，有超過一半的學生起碼在引用與參考文獻方面，不具有基本的學術規範意識，而這還只是學術訓練當中最為基礎的部分。

該所研究生在當期增刊上發表文章，無須經過任何審稿過程，只需交納約人民幣二百六十元的版面費，文章基本上都會被接受。有些人的文章雖曾遭退回，但只是要求規範格式，或儘量把篇幅縮小，以符合「每兩頁為基點收取版面費」的原則。這種增刊的操作並非學術發表領域的「特例」，我們可以從某期刊編輯部對本研究受訪者釋出的「用稿意見」，對增刊的操作規則有較為清晰的認識。

您的來稿 A 經初步審閱，基本符合我刊用稿要求，經研究決定，擬安排於《乙學報（教育科學版·人文／教育卷）》M 期或 N 期發表（「人文／教育卷」字樣不出現在刊物上）……由於該卷尚未與相關數據部門簽訂網絡出版協議以及部分作者保留網絡發表權，該期論文數據不入中國期刊網、萬方數據等〔以上論文名、刊名、期數均為代稱〕。

除知名專家學者的特約稿外，我刊對擬用的校內外所有稿件均收取一定的製版工本費和編輯校對費。收費標準為：250 元（針對研究生）或 300 元／1800-2000 個字。您論文的費用為：550 元……版面有限，我刊將按照匯款順序編輯本期，版滿為止（176 版）。（注：若您考慮到費用問題，對文章做了刪改或壓縮，字數變動較大，您可將稿件發回，要求編輯部重新核定費用。若此稿已為它刊所用，也歡迎您惠寄新的稿件。）

由此可以看到：其一，「增刊」作為正常刊期之外的出版物，不會像「正刊」那樣進入學術市場、圖書館，亦不會進入各種數據庫的檢索範圍。其二，增刊的文章不會經過正式「審稿」，且作者要交納版面費。因此，增刊應視為學術期刊利用版面資源「營利」，及作者尋求發表管道的「共謀」關係之產物。值此同時，獎懲機制的「評分細則」將增刊視為合法發表渠道，實質上是認同了這種尋租式「學術發表」方式。

無論是集體行爲，還是個體行爲，通過此一方式完成「最低任務」的作法，並非個別情況。

我讀碩士的學校，要求兩篇核心論文才能畢業，不過多數人還是完成了任務。我有一次寫了一篇論文，那時候我已經完成了基本任務，然後雜誌說要版面費。我就去問一個沒有完成任務的同學，問他願不願意交版面費，然後可以署名第一作者。他很樂意，那篇論文就是他交的版面費，然後我自己署的第二作者。(XR，博士班一年級，碩士畢業於另一所重點大學)

當然，本文絕不是說，所有的研究生為了避免懲罰，都會採取「增刊」或者「交納版面費」的方式尋求學術發表，我們不能夠排除憑藉學術論文的品質獲得發表的情況，亦不能忽略既有質量又有數量的學術書寫必然存在。但以學術發表為核心、以數量為判定依據的獎懲體制，其結構上就鼓勵一種「追求發表」與「追求數量」的趨向。與此相應，如果「避免無法畢業的懲罰」仍是消極之舉，那麼為了尋求獎勵，則是積極的應對策略。比如一位受訪者的觀察：

我寢室一個女生，光是研一就發了三篇核心、兩篇普通，她堅決說自己的論文是導師推薦的。我們寢室的女生探得她打四份家教的工，就是為了付錢發論文。(CB，碩士班二年級)

有些被訪問者還提到另外一種值得注意的學術生產方式，即導師和學生合署發表論文，<sup>[10]</sup>在這種「合作模式」下，論文的主體一般由學生完成，導師署名後，一方面可以提高發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學生獨自署名時，或許需交納版面費的狀況。蘇力（2004：89-90）曾在論述法學論文的「產出模式」時，特別提到這種現象，他認為，同一學科中，師生之間的合作產出，可能進一步變成一種雙方為了學術發表而締生的利益交換關係；這種學生和導師基於利益的「合謀」——學生利用導師的名聲，而導師利用學生的產出能力——產出的產品質量會逐漸低於獨立發表的作品。

通過增刊、負擔版面費或「利益交換」等途徑尋求發表的行為，並非極端的個案。有研究者曾自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所列 28 種新聞傳播類期刊中，<sup>[11]</sup>抽取 20 種進行調查，發現有近三成提出「付費發文」的要求，其中兩種為付版面費即刊登，一種需負責發行量，四種為「如稿件品質尚可，收取一定版面費可登」（郝俊慧，2005）。一般而言，交納版面費意味著削弱、甚至完全取代對於論文品質的考量。一位碩士生導師提到：

我有些研究生，他們會拿一篇文章給我看……我一看，說你這個文章，有很長的路要走，要改很多，整個沒有發的可能。結果他很神秘地看著我，說這篇文章都可以發了……1500、2000〔元〕……一篇文章，3000 字的文章，核心……任何編輯都可以看得出來，這篇文章很不成熟，或者甚至很差，但是它可以答應給他發，結果就發了。（學者訪談筆記 D，2008.03.07）

在眾多學者的評論中，亦常把版面費視為「潛規則」或「公開秘密」。這些評論偏重從道德層次討論這一問題，但本文認為，研究所學生或其他學術實踐者與整個體制的「契合關係」，更具有顯著意義。因為

，無論是「知識規劃」，還是「集體性知識生產機器」，都是以知識份子的參與和「契合」為前提條件，而其中尤為重要的，即是知識分子與各種「操作」或「玩弄」學術制度安排的腐敗實踐之間，彼此的「契合」關係（鄧正來，2004b）。從本節的經驗材料可見，這種通過交納版面費或其他資源，來補充或替代學術選擇的作法，其實正是學術評鑒制度（在研究所表現為獎懲機制）與學術發表制度在學術實踐者（也包括研究所學生）在「合謀」之下共同培育的「尋租行為」，在某種程度上，亦是深受這兩種結構化學術制度掣肘的整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生態之縮影。

## 伍、獎懲機制與傳播學術教育

設立獎懲機制的初衷，很多時候並不能與其後果相互吻合。Becker, Geer, & Hughes（1968）在研究大學教育中的獎懲機制對學生的影響時，即發現，大學中的教師和管理者本希望通過獎勵系統鼓勵向學，但相反地，這些獎勵機制往往只教會學生如何去「贏取分數」，而不能使他們對所學感興趣，或者激發他們得到真正的創獲。先前引述中，一位受訪者曾表示，由於自己在正刊發表的論文數量少，而無法與別人通過增刊獲取的大量發表成績競爭時，他覺得「很受挫傷」。此個案可謂體現出某種「劣幣驅逐良幣」的趨向。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就像學生會以與其他人不同的方式，應對獎懲機制、展開學業／學術實踐一樣，獎懲機制對每個研究生的影響，也可能有迥然的差異。

如前所論，獎懲機制包含從低到高的多個層次，而其目標就是將規訓對象「分殊化」，其結果是造就了體制所認可的「合格者」和所表彰的「優秀者」。而這些在獎懲機制中表現出色，得到獎學金或優秀評等的學生，是否受到同輩認可或成為新進研究生的榜樣，則是我們檢視獎懲機制是否達其預定結果的途徑之一。對此，部分受訪者表示：

他們比大多數人優秀，比那些根本不想著做研究的人要優秀，但並不一定真正有做學術研究的能力，他們只是發的文章比較多而已。很多人都是拿錢買的論文，根本沒有什麼學術質量。(DS，碩士班三年級)

現在很多……1800 可以幫你寫一篇論文，再發在核心期刊上。有了這些人，我覺得很多發論文的強人到底有沒有學術能力就成為一個無解的疑問。(CB，碩士班二年級)

發表文章很多只能代表學生一方面的能力強，不能說比別人就更優秀。(MW，碩士班一年級)

一方面，受訪者認同表現優秀的同學「學術努力」，但另一方面又同時質疑他們的「學術能力」，這看似矛盾的評價，其實正折射出一個事實，即尋求學術發表過程中的種種「尋租」行為，使得「學術發表」和「學術能力」之間基本的邏輯關聯，亦經常遭到質疑。

這些評價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對優秀與否的判定標準，並不侷限於獎懲機制所衡量的學術發表方面。前面曾經提到，在獎懲機制中援用的評判規則，所衡量者並非研究生的「學術實踐」，而是他們整體的學業生涯。由此衍生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面對業已分化的碩士班學生，以「學術發表」的量化評價作為核心的獎懲機制，是否是進行「合格優秀與否」評價的最好機制？

在新聞傳播的研究所教育領域，這種分化有兩層含義：首先，與其他領域相類似的是，研究生教育的大規模擴張，即便單純從數量的角度來看，也使得它不可能僅僅扮演純粹的學術訓練預備階段之角色。另從研究生的角度來看，他們進入研究所攻讀學位的動機，已經變得非常多元，相當比例的學生並不以畢業後繼續攻讀博士或從事學術研究，作為職業生涯的目標。其次，以 X 大學為例，新聞傳播領域的研究所課程，設置有新聞理論與新聞史、新聞業務、傳媒經營管理、傳播理論、廣告、編輯出版、廣播電視與影視傳播等專業，某些新聞傳播實務的專業

方向，本來即不以培養學術人才為旨，而是以培養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作為目標。針對這種分化現實，一些受訪者認為獎懲機制實有潛在的不公平之處。

我覺得它不太公平。大的來說，把評判優劣的標準放到學術研究方面，太狹隘了。(DS，碩士班三年級)

現在的研究生不再是進來就一定是做研究的。而且現在不應該強迫所有的研究生都去做研究……一篇很好的報道，或者一個得獎的、被採納的策劃案，不能在獎懲機制中獲得認可，那樣很不公平。(FX，碩士班三年級)

不可諱言地，「學術訓練」始終是研究所教育的主線；倘若我們將焦點縮小收束至「學術實踐」層次，一個明顯的問題是：現有的學術評價手段，能否比較好地衡量研究生的學術能力，並激發其學術潛力，激勵他們追求嚴謹而規範的學術訓練，進而促成良好的學術氛圍？任何獎懲機制都會產生「規訓」與「激勵」作用，而以「學術發表」為核心的研究生獎懲機制，亦有可能促動研究生進行與學術發表相關的實踐活動。不過，由於這些學術實踐活動都是直接與學術發表相關，繼而與避免懲罰或尋求獎勵的獎懲機制緊密相連，故它們亦可能「激勵」出某些消極的實踐方式。對於絕大多數研究生而言，必須發表一篇論文才能夠畢業的最低要求，也許最終只是轉化為一項「任務」，其中有人透過集體刊發「增刊」的方式解決，而此外的「個體行為」，則很可能通過交納版面費等形式完成。進一步考察那些「以完成任務為目的」的學術書寫，亦發現，它們缺乏基本的學術規範。這也證明，對「學術發表」的要求，某種程度上並沒有轉換為研究生接受「學術訓練」（學術規範）的渴望。

這一現象也與獎懲機制本身的評量規則有關。量化的評價規則，實質上鼓勵了「只看重數量、不看重質量」的學術發表方式。

〔獎懲機制〕鼓勵你「生產」。〔不過再向前〕那就是「濫寫」吧，為寫而寫。〔我們周圍的氛圍〕就是為了得到這個體制的獎勵，好像有點失去學術研究本來的〔應該追求的東西〕。(FX，碩士班三年級)

我認為〔學術發表〕並不能很好的鞭策研究生的學業，因為當論文質量不再是評價論文是否能發表的唯一依據，過多地強調論文發表的數量會造成論文質量的下降，還有一些其他學術腐敗情況的蔓延。(MW，碩士班一年級)

眾所周知，學術論文的數量產出，並不同於研究者是否有更強的學術實力。特別是對於研究生而言，他們尚且處於接受學術訓練的階段，而這種量化的評價與鼓勵機制，實際上樹立的標竿和努力方向是「學習撰寫與發表論文」，卻不當然等同於「學習做研究」。這種結構化的傾向，也非常可能在研究生當中，醞釀出一種浮躁的學術氛圍。

## 陸、結論與討論

本文聚焦於中國大陸新聞傳播領域研究生的學業／學術實踐，希望從微觀層次著手，近距離檢視學術評鑒制度與發表體制的具體運作，及其對學術生產的影響，同時亦對新聞傳播學術教育提出反思。學術評鑒制度與學術發表制度是研究者從事學術實踐中，最為重要的結構性環境，而科學社會學的規範性探討與經驗研究，皆預設「同行評審」作為二者制度化的根基。立足於中國大陸的具體情境，國家權力這一先設架構，培育出國家規劃型的學術生態，而國家規劃下的學術評鑒核心特徵，即是以數量化為導向，並借助刊物評比的指標或索引，取代對學術產品直接的實質性評價。此外，學術發表體制也深受單位制度的影響，在總體結構與專業實踐等層面，都被特定學術機構壟斷，而無法成為學術社群的公共論壇。

本文之所以將研究生的學術實踐，置於學術評鑒體制和學術發表體制構成的結構環境之下探討，乃是因為研究所中的獎懲機制，簡單化地複製了盛行於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評鑒體制，以數量化的學術發表，作為對研究生進行優劣評定的核心準則。無論是「強迫」還是「鼓勵」研究生發表論文，獎懲機制都從制度層次將「尋求發表」設定為主導研究生學業／學術實踐的軸線，亦使「尋求發表」成為學業實踐的核心目標所在；另一方面，學術期刊領域的單位制與專業評審制度的闕失，使得本應作為學術社群公共論壇的學術期刊，被特定機構壟斷，而其專業操作亦在某種程度上，擺脫整個學術社群的牽制與影響。體現在研究生學術實踐方面，它不僅無法扮演學術訓練之延伸的角色，研究生通過學術期刊與外部學術社群的碰撞，反而在很多時候醞釀出種種「尋租」行為。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認為，這些「尋租」行為，乃是學術實踐個體（研究生）與數量化的學術評鑒制度和學術發表制度相互「契合」的產物，這種「契合」也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整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結構性處境與學術生態。

除探討建基於獎懲機制與學術發表體制所合力塑造出的學業／學術實踐模式，我們亦檢討獎懲機制對傳播學術教育的影響。單純以學術發表為核心的獎懲機制，無法呼應研究生分化的現實；另一方面，獎懲機制過分強調「尋求發表」，反而可能遮蔽與排擠「學術訓練」在傳播學術教育中的位置。「訓練」乃是傳播學術教育的應然主題，「發表」或可成為學術訓練的自然延伸，但絕不能將學術實踐與學業實踐彼此等同。過於功利地將研究所學生拋入學術生產軌道，可能激勵其參與「學術生產」，但未必能鼓勵他們追求嚴謹的學術訓練。許多例子顯示，獎懲制度極可能演變成一種任務導向的「形式制度」，而在學術實踐過程中滋生的增刊、版面費等種種尋租活動，除了直接破壞學術生態，對尚處於學術社會化階段的研究生「心智」，亦可能產生相當消極的影響。正如一位學者在某篇評論中所言，它們可能在最開始即摧毀學術研究在研究生心目中的價值與尊嚴（王彬彬，2003）。

本文立意於從研究生學業／學術實踐的經驗層次，切入對數量化評鑒體制和學術發表體制的探討。這些經驗性的資料與討論，拓深了此前學界偏向於結構性批判的路徑。然而，本文亦有局限之處，即：整個討論緣起於個案，也將實踐主體收束於研究生身上，儘管論述涉及整體性的學術生產面貌，但所得的經驗性證據，尚且需要更為廣泛和深入的檢視。這種檢視仍然可以圍繞本文拓展的學術體制與傳播學術教育這兩條線索展開。一方面，對於數量化獎懲機制在個體實踐與學術生產中的具體運作同其後果，學界應當深入探討，此外亦應思索學術期刊發表如何建立嚴格的評審制度，突破機構利益的困景，從而直接面向學術社群，以共同體的力量，阻斷特定機構的壟斷和失範現象。另一方面，如何在承認研究所學生業已分化的現實情況下，找尋研究所教育的適當位置，同時使傳播學術教育回歸學術訓練的應然軌道，當是傳播教育乃至人文社會科學其他門類的學術教育，必須面對的迫切挑戰。

智慧藏

## 註釋

〔1〕 本文撰寫時，保留大陸用詞，並在該用詞第一次出現時，輔以括號註明台灣用法。此處並製表以便於對照辨識（見表 2）。

表 2：兩岸用詞對照表

大陸用詞	台灣用詞	說明
報道	報導	
評鑒	評鑑	
網絡	網路	internet
課題	研究專案	
無形學院	隱形學群	invisible colleges
把關／把關人	守門／守門人	gatekeeper
同行評審	同儕評議	peer review
評議人	評審	
範式	典範	paradigm
先設	預設	
雜誌	雜誌	
信息	資訊	information
注	註	

〔2〕 中國大陸高等教育院校的學科領域被劃分為「學科門類」、「學科大類」（一級學科）與「專業」（二級學科）三個層次。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頒布的「學科、專業目錄」，決定了大學的專業設置、特定領域的學科歸屬以及頒授的學位名稱，因而，特定領域在該目錄中位置的上升下降，也就顯示出其「學科地位」的變化。在 1990 年頒布的專業目錄中，新聞學作為二級學科，分設於「中國語言文學」及「社會學」兩個一級學科之下，因為此二者分別從

屬於「文學」與「法學」兩個學科門類，新聞學的畢業生因而可授予「文學」或「法學」學位，其學科地位並不明晰。在 1997 年的目錄中，新聞學由二級學科提升為與「中國語言文學」並列的一級學科，並定名為「新聞傳播學」，下設「新聞學」、「傳播學」兩個二級學科。至於「學位授權點」則是指有權開辦特定學科領域博、碩士課程並授予「博士」或「碩士」學位的大學院系，一般簡稱為「博士點」與「碩士點」。

- [3] 本文的討論集中於碩士研究生層次，因此對兩位博士班一年級學生的訪談，主要是請他們回憶碩士研究生階段的相關情況。
- [4] 北京大學圖書館其後陸續於 1996 年、2000 年、2004 年推出新版本。而其他機構進行的「核心期刊」遴選，更有十餘種之多。參見錢榮貴（2006：140-141）的相關討論。
- [5] 陳光興、錢永祥（2005：27）也同時強調，「雖然類似的情況在華文世界、亞洲，特別是東亞的社會中發生，但是具體呈現的風貌及細節不盡然相同，各地批判學界對反應的方式，自然也各有不同」。
- [6] 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論文的平均長度在三頁上下，反映出中國大陸學術書寫與發表體制的特徵：一方面，學術論文與雜感不分，學術期刊充斥著隨感式、有論無證的短文；另一方面，學術期刊視版面為稀缺資源，為在有限的篇幅內刊登更多的論文，對論文字數多有規定。法學者賀衛方（2004）即將某些此類短文斥為「又臭又短」。
- [7] 2006 年，媒體報道指出，幾所國內著名高等教育院校皆廢止了「碩士研究生必須發表論文才能畢業」的要求（代小琳，2006）。不過根據其他媒體的報道，以及依據學生、教師、院系主管處提供的信息，所謂「最低要求」依然廣泛存在，且「獎懲機制」仍在實施。
- [8] 此引文摘自該學院新聞網中的新聞稿，為確保匿名，已改動部分

無實際意義的虛詞和詞序。

- [9] 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曾接觸「通過中介人尋求發表」的個案，此外也可以從一些二手資訊來推測這種作法的普遍程度。如《中國青年報》曾以〈做論文代理已形成產業鏈 一大三學生靠代發論文爲生〉爲題，報道了這種現象（狄多華、馬俊剛，2007）。又如，有受訪者表示，宿舍樓下的佈告欄裡，就經常張貼著論文代理的廣告。
- [10] 某些學校甚至要求研究生發表論文必須由導師署名爲第一作者。這種規定和提高學術產出的機構邏輯，顯有一定關聯。此處所論並不包括那些真正的師生之間的學術合作。
- [11] 作者把「電影電視藝術」（10種）及「攝影藝術」（2種）兩類下的12種核心期刊也納入到新聞傳播核心期刊中，故其總量爲28種，而非本文先前說明的16種。

智慧藏

## 參考書目

- 中國新聞年鑒社（2005）。〈中國新聞專業期刊專輯〉，《中國新聞年鑒 2004》，650-668。
- 反思會議工作小組（2005）。《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台灣學術評鑒》。台北：唐山。
- 王彬彬（2003.10.23）。〈還要荒謬多久〉，《南方週末》，週末新聞版。
- 王焱（2005）。〈知識生產機器與行政支配下的課題審批制〉，鄧正來（編）《中國書評》（第一輯），頁 99-101。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王壽臣（2006.11.13）。〈中國學術論文交易調查：部分核心期刊明碼標價〉，《法制早報》，1 版。
- 代小琳（2006.07.16）。〈人大、北師大等 7 所大學取消一項硬指標 研究生不發表論文也能畢業〉，《北京晨報》，2 版。
- 任劍濤（2006）。〈國家、機構與生產者：三邊關係與知識生產〉，鄧正來（編）《中國書評》（第三輯），頁 110-119。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江曉原（2007）。〈學術界舉刀自戕：核心期刊在中國的異化〉，《社會觀察》，2：12-14。
- 李良榮（2003）。〈期待創新：審視新聞傳播學學術期刊〉，《新聞記者》，3：12。
- 李路路、李漢林（2000）。《中國的單位組織：資源、權力與交換》。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李漢林（2004）。《中國單位社會：議論、思考與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李漢林、李路路（1999）。〈資源與交換：中國單位組織中的依賴性結構〉，《社會學研究》，4：44-63。
- 杜駿飛（2007）。〈中國大陸新聞傳播學期刊學術水平與排名分析：基於

- CSSCI 的次級研究》，《中國傳媒報告》，1：104-124。
- 狄多華、馬俊剛（2007.07.06）。〈做論文代理已形成產業鏈 一大三學生靠代發論文爲生〉，《中國青年報》，1 版。
- 胡春陽（2008）。〈直擊中國傳播學博士教育困境〉，《今傳媒》，1：75-76。
- 郝俊慧（2005）。〈「錢稿交易」的背後：新聞傳播學科專業期刊境況探究〉，《新聞記者》，2：19-22。
- 馬忠文（2007）。〈一刊兩制：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文獻引證體例的最佳選擇〉，《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127-131。
- 張瑩、申凡（2004）。〈從《現代傳播》（1994 -2003 年）管窺我國十年來的傳播學研究〉，《現代傳播》，5：48-51。
- 張曉鋒、馬匯瑩（2007）。〈新聞傳播學研究生教育現狀與挑戰：「中國社會與中國新聞傳播教育」高層圓桌會議綜述〉，《新聞記者》，1：62-64。
- 許紀霖（2005a）。〈學術期刊的單位化、行政化和非專業化〉，《新華文摘》，4：127-128。
- 許紀霖（2005b）。〈知識的生產是如何「再度國家化」的？〉，鄧正來（編）《中國書評》（第一輯），頁 113-116。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陳光興、錢永祥（2005）。〈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下的學術生產〉，反思會議工作小組（編）《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台灣學術評鑒》，頁 3-29。台北：唐山。
- 賀衛方（2004）。〈學術期刊的空間與方向〉，《雲夢學刊》，25（4）：14-15。
- 黃厚銘（2005）。〈SSCI、TSSCI 與台灣社會科學學術評鑒制度〉，反思會議工作小組（編）《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台灣學術評鑒》，頁 87-108。台北：唐山。
- 楊玉聖（2006）。〈學術期刊與學術規範〉，《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1（2）：43-49。

- 葉繼元 (2005)。〈學術期刊與學術規範〉，《學術界》，4：57-68。
- 鄧正來 (2004a)。〈研究與反思：關於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增訂版）。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 鄧正來 (2004b)。〈對知識分子「契合」關係的反思與批判：關於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再思考〉，《天津社會科學》，6：4-11。
- 鄧正來 (2005)。〈中國學術刊物的發展與學術為本〉，《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45 (4)：7-14。
- 錢榮貴 (2006)。〈核心期刊與期刊評價〉。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 蘇力 (2004)。《也許正在發生：轉型中國的法學》。北京：法律出版社。
- Altbach, P. G. (1987). *The knowledge contex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Becher, T., & Trowler, P. R. (2001).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 Intellectual enquiry and the culture of disciplines* (2<sup>nd</sup> ed.). Philadelphia: The Society of Research into Higher Education & Open University Press.
- Becker, H. S., Geer, B., & Hughes, E. C. (1968). *Making the grade: The academic side of college life*.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 Beyer, J. M. (1978). Editorial policies and practices among leading journals in four scientific fields.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9(1), 68-88.
- Beyer, J. M., Chanove, R. G., & Fox, W. B. (1995). Review process and the fates of manuscripts submitted to AM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8(5), 1219-1260.
- Boots, B. (1996). Referees as gatekeepers: Some evidence from geographical journals. *Area*, 28(2), 177-185.
- Bornstein, R. F. (1990). Publication politics, experimenter bias and replication proces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Journal of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5, 71-81.

- Braun, T. (2004). Keeping the gates of science journals. In H. F. W. Moed, W. Glänzel, & V. Smoch (Eds.), *Handbook of quantitativ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Berlin: Kluwer-Springer.
- Braun, T., & Diospatonyi, I. (2005). The journal gatekeepers of major publishing houses of core science journals. *Scientometrics*, 64(2), 113-120.
- Campanario, J. M. (1998). Peer review for journals as it stands today - Part 1. *Science Communication*, 19(3), 181-211.
- Caplow, T., & McGee, R. J. (2001). *The academic marketplace*.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Chubin, D. E., & Hackett, E. J. (1990). *Peerless science: Peer review and U.S. science polic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Crane, D. (1967). The gatekeepers of science: Som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election of articles from scientific journal.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s*, 2(4), 195-201.
- Crane, D. (1972). *Invisible colleges: Diffusion of knowledge in scientific commun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inauer, L. D., & Ondeck, K. E. (1999). Gender and institutional affiliation as determinants of publishing i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5(4), 548-569.
- Glogoff, S. (1988). Reviewing the gatekeepers: A survey of referees of library journal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39(6), 400-407.
- Greenwald, A. G. (1975). Consequences of prejudice against the null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2, 1-20.
- Gumport, P. J. (2002). *Academic pathfinders: Knowledge creation and feminist scholarship*.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 Hagstrom, W. O. (1975).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Carbondale: Southern

-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 Hamermesh, D. S. (1994). Facts and myths about referee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8(1), 153-163.
- Hargens, L. L. (1988). Scholarly consensus and journal rejection r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1), 139-151.
- Haskell, T. L. (2000). *The emergence of professional social science: The American Social Sciences Association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crisis of authority*.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Hodgson, G. M., & Rothman, H. (1999). The editors and authors of economics journals: A case of institutional oligopoly? *Economic Journal*, 109(453), F165-F186.
- Kerr, S., Tolliver, J., & Petree, D. (1977). Manuscript characteristics which influence acceptance for management and social-science journal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 132-141.
- Light, D. (1974). Introduction: The structure of the academic profession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47(1), 2-28.
- Lindsey, D. (1978). *The scientific publication system in social science: A study of the operation of leading professional journals in psychology,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SF: Jossey-Bass.
- Long, J. S., & McGinnis, R. (1981). Organizational context and scientific productiv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4), 422-442.
- Merton, R. K.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 Merton, R. K. (1973).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Newcombe, R. G. (1987). Towards a reduction in publication bia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95, 656-659.
- Nisonger, T. E. (200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editorial

- board composition and citation measures in political science, business, and genetics journals. *Scientometrics*, 54(2), 257-268.
- Peters, D. P., & Ceci, S. J. (1982). Peer-review practices of psychological journals: The fate of accepted, published articles, submitted agai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5(2), 187-195.
- Pfeffer, J., Leong, A., & Strehl, K. (1977). Paradigm development and particularism: Journal publication in three scientific disciplines. *Social Forces*, 55(4), 938-951.
- Shamblin, D. H. (1970). Prestige and sociology establishment. *American Sociologist*, 5(2), 154-156.
- Smith, R. (2006). Peer review: A flawed process at the heart of science and journals.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99(4), 178-182.
- Strauss, A., & Corbin, J. (1998).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2<sup>nd</sup> ed.).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 Whitley, R. (2000). *Th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cienc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oels, W. C. (1974).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fields and the allocation of editorships on scientific journals: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5, 264-276.
- Zsindely, S., & Schubert, A. (1989). Editors-in-chief of medical journals: Are they experts, authorities, both, or neithe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6(5), 695-700.
- Zuckerman, H., & Merton, R. K. (1971). Patterns of evaluation in science: Institutionalisation,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the referee system. *Minerva*, 9, 66-100.

# Academic Practice under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System

Hong-tao Li\*

##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depth interview data,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graduate students in China study and do research, subject to the constraints of the current evaluation system, which is dominated by quantitative criteria. 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 reward system in graduate school hinges on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publication. The graduate life thus focuses upon seeking publications. This kind of interaction among students,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and scholarly publication system has resulted in a variety of rent-seeking activities. By placing undue emphasis on "seeking publication", this system also marginalizes the importance of academic training.

**Keywords:**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scholarly publication, reward and punishment system, conformity, academic education in communication

智慧藏

\* Hong-tao Li is Ph.D. Candidate at the Department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